

文史技艺

方志编纂略述

方志起源于何时？这是古今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长期探索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起源于《禹贡》，有的认为导源于《山海经》，有的认为肇始于《周官》，有的认为始自《越绝书》《吴越春秋》或《华阳国志》。不管怎么说，方志起源极早，是古已有之的，涵盖地方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历史状况，或某一项、某一范围的重要文献典籍。

中国古代方志的产生和发展与封建政治制度演变密切相关，早期方志的编纂是伴随着封建郡县制的产生而产生的。清人高锡爵在《重修临洮府志序》中曾说道：“自秦汉而下，置封建为郡县，而郡县则例有志。”为什么秦汉时代会产生方志呢？首先是因为朝廷统治天下的需要，其次是因为地方官治理郡县的需要。中国早期方志之所以被称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本身就说明早期方志是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记载范围的一种著作。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从前“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使在位者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中国地方志综录·序》）。这是说古代编修方志，是以“资政”“教化”为其基本社会功能，是以各级施政长官为基本读者的。正如明代《嘉靖山西通志·序》中所说：“治邦国者，以志为鉴。”总而言之，旧志书为官所修，主记官事，为官所用，官气十足，这就是中国旧方志的基本特征。

古往今来的方志工作者也总是把“鉴古知今”视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例如，宋人郑兴裔在论及志书作用问题时就这样说道：“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广陵志·序》）

中国地方志名称繁多，历朝历代各地普遍编修，同一省府州县的志书先后迭出。宋代以前，地方志书经历了地理书、郡书、都邑簿、地志、图

经、图志等形式，在它的这一起源和雏形阶段，编纂的连续性还不明显。因此，宋代以前，“州县移易，其书遂废”。宋代方志开始有“沿革”的惯例，即后志保存前志的内容，又增加了许多新的事物。宋代续修的方式为后人所继承，但宋元方志不同于后者一个特点是，新志成而旧志废，因此宋元时期编纂的志书留存下来的很少。

从明代开始，改变以前的传统，前志不废，后志为续，逐渐使方志续修制度化。清代、民国时期，对修志均有详细的规定和明确的要求。如清雍正时规定各州县每六十年一修；民国时期规定省志三十年一修，县志十五年一修。虽然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一致，有的相距五六十年，有的相距七八十年甚至一二百年，但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各地方志普遍会进行二次或多次编修，绝大多数地方的方志一修再修，连续编修两次以上的省府州县志不下半数，有的甚至四修五修或更多次数。

余姚方志的编纂，宋元以前不可知。余姚人虞预曾编纂过《会稽典录》，可惜早已散佚。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先生根据《太平御览》《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等诸多古籍疏注整理出鲁迅版《会稽典录》，出版于1946年，共计120则，并附录存疑1篇，但已非原貌。何况唐人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说：“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士族，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史通·杂述篇》又进而说：“若……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由此看来，《会稽典录》只能算作郡书，算不得县志类方志。

现在所知最早编纂的《余姚县志》修订于明代永乐年间，此志可看作余姚县编修志书之开始。可惜此志书早已佚失不存，卷数与撰修者均不可考，仅在由明人杨士奇撰写于正统年间的《文渊阁书目》中，对此志书有著录。

第二部余姚县志为明代《嘉靖余姚县志》，共17卷，知县顾存仁发起，由布衣岑原道主编，会同杨抚、胡膏纂修，于嘉靖十四年（1535）修成。

顾存仁（1502—1575），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后，即任余姚知

县，至嘉靖十五年离任，进京升任礼科给事中。有《太仆寺志》《东白草堂集》诸作。本志即编修于顾存仁担任余姚知县期间，于嘉靖十四年成书，至嘉靖二十一年刻板印行。《千顷堂书目》《内阁藏书目录》《万卷堂书目》著录。可惜现仅存残本13卷（存卷5~17，附外纪1卷）。上海图书馆藏有光绪间会稽徐氏铸学斋抄本。

第三部是《万历余姚县志》，24卷，明万历余姚知县金坛史树德主修，由本邑杨文焕、沈应文、邵圭、叶宪祖等编撰，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启动，仅7个月而成书，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印，分装6册。此书见《澹生堂藏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及日本国会图书馆等有藏本。本志有沈应文《序》云：“岁辛丑，金沙史侯来莅兹土……属不佞应文偕给谏杨公文焕，一时同事编摩者为孝廉邵君圭、叶君宪祖，而采辑则诸生翁大端、邵应祺、朱文辉分任之，凡七阅月而志成。”

第四部是《康熙余姚县志》，由余姚知县辽东人李成龙主修，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成书，不几年即残失，未见传本，卷数不详。后任余姚知县康如连曾在《康熙余姚县志》序中对此志说道：“姚之志，癸亥间前李令尝修之，迄于今虽川原如故，风土依然，然未十年，而残缺失次者已不但鲁鱼豕亥之感，则数千百年间……其潜德之幽光，必多失于断简残编。”

第五部即《康熙余姚县志》25卷本，余姚知县安邑康如连在李成龙初修本的基础上于康熙三十一年重修，补拾旧志，仅3个月而完成初稿，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编定，即时刊印。编纂此志时，黄宗羲出力较多。此书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三著录。现北京图书馆有藏本，上海图书馆有胶卷。

第六部是《乾隆余姚县志》，共40卷。余姚知县三原唐若瀛主修，由邵晋涵等纂修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六年刊刻，共8册。北图、北大、天津、南图、南大、上图、复旦、中大等馆均有此志书藏本。

第七部为《光绪余姚县志》，未详纂修人名氏。初修于光绪十九年（1893），叙事至是年止，原定40卷，书未完成。上海图书馆藏有是志初稿本13册。

第八部是《光绪余姚县志》，27卷首1卷末1卷本。本志即在草创于光绪十九年初稿本的基础上，于光绪二十三年重修，由余姚知县南海人周炳麟主持，余姚邵友濂、会稽孙德祖等纂修，调整卷目，至光绪二十五年完成。此志人物传部分多取材于嘉庆时余姚吴大本撰《名宦乡贤忠义三祠传记》，共27卷，外加2卷，刊本分16册，此志流传较多。民国二十四年（1935），曾对此《光绪余姚县志》重排铅字本印了150部，以广流传。1974年12月，由台北“余姚同乡会”会员集资，由邑绅张元杰主持，将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光绪余姚县志》原本予以拍照缩印，每4页缩成一页，装订成16开本一巨册。2008年，由余姚市政府出资，文化局主持，按原样宣纸影印1000部，分送相关部门，剩余存书在2013年的水涝中损失。

第九部为《民国余姚县新志稿》，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干人俊等发起撰修，共26卷，未刊，仅存手稿本6册。

早在1961年9月，余姚县政协便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文史工作组，对余姚境内史料进行收集。1963年春，因余姚、慈溪两县于1954年10月进行县界调整，众多事件交叉混合，互有牵联，特于是年设置“姚慈两县县志编辑筹备处”，由余姚县长郭子栋兼任筹备主任，慈溪县副县长陈旭与叶令民、姜枝先为副主任，孙子民、陆而天、黄宗正、经贯之等10余人筹为筹备处筹备员；丁桂芳为秘书，负责保管史料；以余姚县政协为主，筹备处着手对余姚、慈溪境内的重要史料进行座谈、收集、整理，由黄宗正任主笔，初拟两县联合草编新志。后因“文化大革命”发生而中止，筹备处工作被迫停止，县志草创即告夭折。所积累138万字资料暂且保存在余姚县政协办，是一笔珍贵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2013年10月7日，余姚遭受突发性水涝，政协办1楼储藏室进水，这批史料全遭水淹，成为纸泥浆水，一纸不存。

第十部即新编《余姚市志》，1986年5月，成立余姚市地方志办公室，由市政协原主席章亦平任主编，编纂新志稿，叙事下限至1987年年底，设专志32编，叙事详今略古，共120万字，1993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

版。可惜的是，编纂过程中对“姚慈两县县志编辑筹备处”征集的138万字的“三亲”史料，未能予以借鉴引用。

第十一部新编《余姚市志》，2006年成立编纂委员会，由市政协现任主席陈建泰任主编，叙事上限至1988年，下限至2010年年底，48编，共168万字，201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余姚一地，除县市志之外，尚编撰有不少乡镇区域志书。

余姚《临山卫志》4卷，由明代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把总朱冠、耿宗道创修，聘请张训、谢铁、陈原中3人编纂。原刊本未见，中央历史研究院地理所有抄本。现有民国三年（1914）木活字排印本通行于社会。

临山卫在余姚县西北，明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大将军汤和略地浙东，以余姚临山、三山为要害之地，用制险塞，遂上疏朝廷允准，于余姚境内添筑了两座城池，一为临山卫城，一为三山所城。志中所载地方史事，自明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倡议设立卫所时起，至明嘉靖末年止。现所见民国三年重刊本，前面有谢宝濂的序，后有谢宝书的跋，他俩均为第四门人。跋语中说道：“庚戌春，临山诸君子访得旧钞本，已议付手民矣。不幸，夏间，七申乡人毁凤山乡校，此本亦遭殃及。嗣又辗转借得旧钞本……今亦不多见，宜临山诸君子之亟亟保存也。”《临山卫志》还附印有卫城地图，手绘木刻，大致准确。

本书虽名为《临山卫志》，但所记载的内容除临山本卫之外，兼及三山所（浒山）与沥海所（沥海守御千户所原属会稽县，后属上虞县，亦各有志书），均为明初为防备倭寇而设，在军事指挥系统上属于临山卫。

《四明山记》，汉寿春梅福撰。梅福《汉书》有传。此记久佚。清黄宗羲作《四明山志》，全祖望撰《句余土音》，均引用此记。四明山在今余姚县南，界鄞州、奉化。

《四明山记》，晋广川木华（字元虚）撰。《四明六志校勘记》卷九云：宋僧赞宁所作《荀谱》，曾引木元虚此书。

《四明山记》1卷，不知撰人名氏。此书见《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乾隆鄞县志》著录，今不可复得。《乾道四明

图经》及《宝庆四明志》皆征引此记。

《四明山志》9卷，清余姚黄宗羲纂。本志初纂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成稿于康熙十二年（1673），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吴门黄氏刊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明丛书》第四集本。《四库总目提要》云：“四明山旧称名胜，而岩壑幽邃，文士罕能周历，故记载多疏。宗羲家于北七十峰之下，尝扞萝越险，寻览匝月，得以考求古迹，订正伪传。乃博采诸书，辑为此志，凡九门。宗羲记诵淹通，叙述亦特详贍。惟所收诗文过博，并以友朋倡和之作牵连附入，犹不出地志之习。”周中孚云：“四明山在余姚县南，南接天台。其初总名天台山，后乃分割，道书谓之第九洞天。山有二百八十峰，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故号四明。梨洲家居黄竹浦，当山之极北。旧本无志，尝以己所亲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抵牾失实。因为是志以订正之。凡分九门：曰名胜、曰伽蓝、曰灵迹、曰题考、曰丹山图咏、曰石田山房、曰诗话、曰文括、曰撮残。其间博采题咏，搜寻碑刻，考核详而辨证确，诚足补是山之缺典也。前有康熙甲寅自序及朱彝尊、宋定业、靳治荆及其弟宗裔四序。”（《郑堂读书记补逸》卷十六）

《四明山志》初稿本，凡5卷，题《四明山古迹记》。《四库全书》据浙江巡抚采进本存目。《四库总目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详书中所载，即黄宗羲所撰《四明山志》稿本也。”《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亦云：“即《四明山志》之稿本，中多涂乙处，但互有详略，两存之。”康熙刊本黄宗羲自序略云：“壬午岁（崇祯十五年），余作《四明志》，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未果。癸丑（康熙十二年）岁尽，偶展此卷，文虎评校之朱墨如初脱手。然其间凡例不齐，词不雅驯，重为窜改，始得成书。”此书《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史稿·艺文志》著录。

《浒山志》8卷，高杲、沈煜纂。道光三年（1823）成书，道光十一年（1831）刊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有重印本。高杲在《浒山志·序》中写道：“东汉南阳撰记风俗之后，郡邑始各自为志。而郡领邑，邑领乡，乡领村。邑则乡之所汇也。浒山，海微片壤，鱼盐蜃蛤之乡，自唐永

兴筑城虎屿南，人贤渐起；至元、明，蔚为邑望第。物换星移，集载事之编，不能无遗笔也；求名胜之迹，不能无遗没也；述故旧之闻，不能无遗说也。志其难矣哉！余搜罗摭摭编昉于辛巳，稿脱于乙酉。经沈子鹿园点而定之。其难其慎，不敢出以示人。呜呼！数年来胡丈竹坡、沈子鹿园先后归道山矣。今年春，鹿园之侄补庵余门下士请寿梨枣，余恐操是柄者蝇壁改观，冤抑误漏，谁之咎欤！复于各门详加考核，增补若干页，庶郡、邑志轶而不载，载而不详，详而不实者，得是编可以征信云。道光辛卯夏五竹醉日，解禅高杲亭午氏书于碧芸轩之南窗。”浒山原属余姚县，称三山所，故将《浒山志》列于余姚方志内。

余姚县《六仓志》44卷，首1卷，末1卷。杨积芳总纂，张宝琛协纂，余姚县知事古闽人陈赞唐撰志序。是书于民国七年（1918）开局编撰，次年竣稿，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8册，是民国时期优秀地方志之一。

“六仓”为埋上仓、埋下仓、柏上仓、柏下仓、梁上仓、梁下仓之总名，跨有余姚县7乡，东临慈溪县，西靠上虞县，北尽于海。《六仓志·卷尾》写道：“丁巳春，仓下士张午炎发起编造六仓志乘，次年戊午二月设局于云柯校旧址，己未冬告竣。”

《东山志》10卷，清代谢起龙编纂本，编纂具体年份不详，内容记载余姚东山（第四门），是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姚西北地理风貌、人文景观的地方志书。有宣统二年（1910）余姚谢氏重印本，上海图书馆、嘉兴图书馆收藏。本志见乾隆《绍兴府志》著录，著作年代未详。

另有明余姚人谢敏行编纂的《东山志》19卷，有明万历四年（1576）、清康熙六年（1667）、道光六年（1826）3个刻本。写的乃是上虞之东山，不属余姚方志。

参修校印史志

校印《资治通鉴》

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起于唐五代，盛于宋代。宋代刻书内容范围极广，各种书籍都有。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多数亦是拿到杭州去刻印，而并非在汴京。宋代词人叶梦得曾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为下是也。”一句话就高度囊括了宋代印书的三大区域性。于此期间，私人刻书以文集最多，坊间刻书则以售卖营利为主，除了刻印经文以外，又另刻有字书、小学等民间所需用及士子应举所需要的读物，品类丰富繁多。

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南下，赵宋朝廷南渡，被迫在临安建立起南宋王朝。仓皇南渡之下，原北宋朝廷国子监藏书毁弃殆尽，秘书省、国子监的刻书力量被大大削弱。

自宋都城南迁临安，国子监已经无力重刻复印。朝廷曾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只好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政府部门刻印，然后送归国子监。朝廷如此放开刻书政策，送到国子监的印书数量也还是很有限的。当时，杭州书坊林立，有名可考的印刷作坊就有几十家之多。在京都的影响之下，浙江的刻书又分为三大区域：越州（绍兴）、婺州（金华）与明州（宁波）。

当时，余姚县归属绍兴府，绢、茶、盐业极为发达，“姚黄”竹纸更是驰名全国，并由此带动了余姚印刷业的发展，于是294卷的巨著《资治通鉴》即放到余姚来校刊印行。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协修，成稿后由司马光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资治通鉴》历时19年

完成，共294卷，约300万字。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停笔，全书按朝代分为16纪，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书中，编者总结出许多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另有《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各30卷。

《资治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1085），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十月校定完毕，奉圣旨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曾刊印行世，或因印量极少，流通不广，又因两宋之际，战乱不息。北宋靖康元年（1126），受金兵南下所迫，宋王朝只得在临安（杭州）偏安一隅。而原北宋国子监书版即因兵灾全遭毁弃，秘书省、国子监的刻书力量被大大削弱。因此，在南宋建立初期，只得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作为蓝本。此时的国子监已无力重雕，故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政府部门负责刻板，然后送归国子监，这就是地方官刻的由来。

由于在南宋初年，“元祐本”已不可见，为保存《资治通鉴》成果，绍兴二年（1132）七月初一，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下令，由绍兴府余姚县刊版《资治通鉴》。由余姚著名文化人钱移哲、杜邦彦、叶汝士、陆、顾大冶、吕克勤、张彦衡、朱国辅、杜绂、孙彬10人任校对，事后均赐进士出身；以及嵊县进士9人协助校对；由余姚县主簿王綰、县丞冯荣叔、晏敦临参与事务；由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张九成监视，于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毕工，印造呈献京师皇城。一部浩浩294卷巨著《资治通鉴》居然放到余姚来校印出版，这是对余姚文化人的信任，又借用余姚出产的土纸和印刷技术力量，印造了现存最早的宋代余姚官刻本。余姚重刻本于孝宗朝或稍后印行，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余姚重刻版本。清代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被认定是南宋光宗（1190—1194）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被认定是南宋初期的福

建刻本。

余姚重刻本版式框高21厘米，宽14.1厘米，半叶12行24字，白口、左右双边。白麻纸印本，纸墨莹润，刀法规整，字体方整端重，宋讳缺笔至“构”字，“慎”字间有剝去抹画痕迹，当是孝宗朝稍后印本。版心下记刻工名，皆南宋初期杭州地区习见良工，多见于同时所刻他书。卷末原有绍兴二年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校勘官衔名，钤有“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迭经文徵明、顾从德、季振宜、徐乾学等名家所珍藏，清初又为内府天禄琳琅收藏，现藏北京图书馆。

至今，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的余姚重刻本亦发现较多残缺。1954年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工作委员会，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依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1955年年底标点完成，1956年6月重新出版；此后转由中华书局出版。所以说，时至今日，通行的《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即是以当时余姚的重刻本为底本，重新整理后出版的版本。

现如今，珍奇的宋版书已是难以得到，“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句老话自清代以来就流传于古玩行里，可见宋版书的难求与珍贵。

参修《元史》

明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惩劝，不可废也”。遂以从元都内官所得《元十三朝实录》为基础，任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祚为总裁，特征全国各地著名儒士16人，于洪武二年二月开局编纂《元史》。当时特征至京参与《元史》编纂的16人是：汪克宽、胡翰、陶凯、陈基、赵坝、曾鲁、赵汭、张文海、徐尊生、黄麓、傅恕、王铨、傅著、谢徽、高启以及余姚人宋僖，然后以抓阄分科修纂，宋僖分得较为难写的《外国传》部分。洪武三年六月《元史》定稿，共210卷，共136.6万字，历时331天。

由于《元史》编撰时日迫促，不暇致详，潦草完事，历来有“《元

史》草率”的评议。然而《元史》虽有不少谬误，但由于写《元史》的原始资料《十三朝实录》多出于熟于掌故之人，大体亦尚完整，编修《元史》的诸臣即凭原始资料抄撮成书，故诸列传尚多老笔而无酿词，元代一朝制度，亦颇详赡具体，保存了元代较原始的史料，仍有着较大的研究价值。

待《元史》修成，宋僖不愿任职，只求归家。然朱元璋见宋僖耿直廉正，文笔佳美，特于洪武四年八月，委派他任福建乡试主考官。因明建国粗定，该年乡试有别于惯例，合京畿、河南、陕西、北平、山东、山西、湖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11省及高丽的全部学子凡200人在京畿乡试。宋僖奉命主闽，出试题为“礼之用和”节，经过认真甄别，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才学之士。典试完毕，即归家，以著述、教授而老死家中。留下的著作有《庸庵文集》《庸庵诗集》《文章绪论》。因家贫无力付梓，仅以抄本流传，以致《文集》大都散佚，《诗集》及部分文稿后收入《四库全书》为《庸庵集》14卷。因宋僖曾参与编修《元史》，后人就称他南城醮醮弄的故居为“修文里”，后于1999年10月因醮醮弄改造，“修文里”被拆毁。

参修《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七月，成祖命大学士解缙等编辑《大典》，于次年十一月成书，开始时定名为《文献大成》。因编纂匆遽，内容不够完备，明成祖不满，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余姚人）与解缙重新监修《大典》，并特征才学之士入京参与其事。被特征才学之士入京参与其事的余姚人除监修刘季篪外，还特征宋绪、宋孟徽、赵肤迪、朱德茂、张廷玉5人修纂《大典》，各地特征修纂《大典》的人数以余姚人为最多。

刘季篪，名韶，洪武二十七年（1394）进士，任行人司行人。后因出使朝鲜，办事廉洁，回国后擢升为陕西参政。刘季篪一到陕西任上，即与僚属分行郡县，免除百姓的旧年欠赋，整治水堰，罢钢砂等不急之贡，为

民办了大量实事。建文初年，被召回京城任刑部侍郎。在审理案件中，能辨析疑案，昭雪民冤。到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即命刘季篪及姚广孝、解缙3人监修《大典》。

宋绪，字公传，有志于学，为人严守节操。永乐初，与仲父宋孟徽及赵肤迪、朱德茂、张廷玉同被特征修纂《大典》。至永乐五年十一月《大典》告成，明成祖朱棣赐书名为《永乐大典》。凡参与修纂的人均各授官任职，唯独宋绪拒绝任职，甘愿辞归故乡，教授子弟，得到成祖的嘉许，赏赐归家。

为编撰《大典》，广采各种图书七八千种，历时5年才得以完成。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艺等各类著作，共达7000多种，内容丰富。

《永乐大典》的修成，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复见于世。”所收录内容包括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阴阳、僧道、技艺等各家之言，许多不见存于后世的佚文秘典，幸赖《永乐大典》的辑录而保存了本来面目，得以流传下来。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失传的古籍500多种，它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

《永乐大典》只抄有正本一部，成祖定都北京后，移藏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录正副两部，至隆庆初完成，原本仍送南京，正本贮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明代灭亡，南京原本被毁。清初时，原藏皇史宬的《永乐大典》副本移藏于翰林院。自此开始，即有多人趁借阅翰林院藏书之机大肆偷盗《永乐大典》。至乾隆时清点，已只有9000多册，至光绪元年时清查，只剩下5000余册。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间，又有文廷式一人借读《永乐大典》300册，即盗走了100册。由于先后多人盗窃，至光绪十

九年清点时只剩下600余册（一说800余册）。这就是说，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前，已经被盗走、毁损了10000余册。据史料所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国人围攻外国使馆区，纵火时延及翰林院，部分《永乐大典》再被焚毁，部分被国人所盗。待过了54天之后，北京即被八国联军所占，八国联军又盗走了翰林院焚余图书，劫往英、美、法、俄、日等国，有的流入私家度藏，有的归入博物馆。这次被八国联军盗去的，实际上只是原数的1/20而已。至宣统元年时查点翰林院残存《永乐大典》，只有64册了。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存世的《永乐大典》仅有400余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收藏机构，加起来不到原书的4%。

《永乐大典》被盗、被焚毁，致使我国许多珍贵少见的古籍失传，此实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

后经历年搜寻、捐献，从1912年第一批《永乐大典》入藏到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已拥有221册（含现存台湾的60册），超过全球藏量的半数。

参修《四库全书》等史志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纂修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十六年（1781）编定。《四库全书》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36000册，约8亿字。《四库全书》编成用了不到10年时间，由于还得分抄七部分藏于七地，所以前后共用了14年才全部结束。各部《四库全书》告成的时间是：文渊阁本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文溯阁本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文源阁本亦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文津阁本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这4部即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北四阁《四库全书》。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书稍晚，是在同一年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完成的。

为《四库全书》做出最大贡献的即是余姚人邵晋涵。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是一位清代史学界的旷世奇才，他给史学领域留下了丰硕成果，是一位有才有识的大史

学家。他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史部》的《提要》即出于他之手。他在金石学、音韵学、方志学上均有着较高的造诣，曾被章学诚称为“浙东学术的殿军”。

乾隆三十六年（1771），邵晋涵礼部会试第一（会元）。乾隆三十八年，朝廷开《四库全书》馆，纪昀任总裁，延置群儒，大学士刘统勋特推荐邵晋涵，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与戴震等同入馆编校。邵晋涵以史学冠绝当时，于历代史事融会贯通，尤精熟于宋、明史料及当代史事，故此凡史部诸书，多由邵晋涵校订，史部提要亦多出于他的手笔。他所写史部提要，不囿于前人旧说，敢创新见，议论风发，持论公允，能击中史著之病，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继承浙东史学传统，又能够融合汉宋学术的风格。尤其是史部提要可以说是邵晋涵的史学评论专著。

乾隆三十九年，邵晋涵边纂校《四库全书》，还兼辑《续三通》（《续通志》《续通考》《续通典》）。乾隆四十年，因编撰有功，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邵晋涵还辑校《旧五代史》。元明以来，《旧五代史》传本亦渐就湮没，邵晋涵就依《永乐大典》辑录遗文，将分散在各韵中的《旧五代史》原文逐条辑录，再依《玉海》以辨其篇目次第，详为考核，荟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录《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北梦琐言》等书籍，补正缺误；参考《五代春秋》《十国春秋》《九国志》等及宋代人的说部文集，以资辨证，使卷帙悉符原书。至乾隆四十年辑校完毕，大体恢复了《旧五代史》原貌，终于使几近湮灭的《旧五代史》重新传世。邵晋涵还受邀于毕沅，对《续资治通鉴》复审。还参与《万寿盛典》《八旗通志》的纂修。他在史馆10余年，名卿列传均出其手。

邵晋涵是姚江学术宗派的代表，浙东学术之殿军。20世纪80年代，为建巍星路菜场，巍星路东侧的邵晋涵故居“会元房”被拆除。

秘图山前的续兰亭会

秘图山，山极低矮狭小，本名方丈山。据说早在远古时期大禹治水时，曾把治理姚江的图纸收藏于此山中，并建竖有“神禹秘图”碑，故称之为秘图山。山前有勺水，即秘图湖，历代官宦喜好宋人周敦颐《爱莲说》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即于水中栽植荷花，民间称之为荷花池。

东汉建安五年（200），东吴君主孙权委任19岁的朱然为余姚长，赴任余姚，择地于此建造县衙。自此之后，秘图山前即成为余姚县衙所在地，历时已达2000年之久。后经历朝增修扩建，形成体势庞大的古建筑群。可以说，秘图山前是历史悠久、格局完整的古县衙遗存。直至1995年余姚市政府搬离，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余姚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早在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风流宰相谢安，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等会集文学之士41人欢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行修禊之事。“修禊”本是古代民间的习俗，原定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举行，自魏之后，改为每年三月初三，约集亲朋好友，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的邪气，称为“修禊”。《后汉书·志·礼仪上》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洁，是一种热病，这里引申为一切疾病。东汉著名学者蔡邕说：“《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当日的兰亭之会，就是利用古礼习俗而举行的一次文人集会。这一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茂林修竹”之旁，围坐清流之滨，做“流觞曲水”之戏。参加集会的有右将军司马孙丞公等41人，各人赋诗以咏己志，甚可乐也。可惜的是，当时有余姚县令会稽人谢胜等15人，一时诗凝笔滞，赋不成诗，即按规矩每人各吃罚酒3斗。

3斗酒可不是玩的，就算晋代的酒味极淡，3斗清水下肚，也得撑破你的肚皮。不过，兰亭修禊之会仍不失为我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为后人所大肆传颂。后更有王羲之醉后挥毫，写成《兰亭集序》墨迹，文佳字美，为历代所传颂。当时，王羲之自己也认为这篇“《兰亭集序》仿《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这里说到的“金谷”，在洛阳的东北，是晋代首富石崇所筑的庭院，世称金谷园。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说：“梓泽，去洛城六十里。梓泽，金谷也，中朝贤达所集，赋诗犹存，是石崇居处。”石崇《金谷诗序》中也写道：“余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木、草药之属。”园中亭台楼阁，奇花佳树，财产中积，室宇宏富，为一时之胜。内藏美人数百，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王公贵戚以奢靡相尚。石崇好积财货，仍能好学不倦，年二十余时已有一定的声望。他善于结交文人名士，时有众多的文学家如潘岳、贾谧等时相往来，号称二十四友。王羲之《兰亭集序》历来是尽人皆知的传世墨宝，成为我国书坛上的神品。到宋代庆元年间，施宿担任余姚知县时，曾令匠人刻苏东坡诗墨迹多首，藏于县斋“翰墨堂”。继任者常褚又精摹增刻了王羲之《兰亭集序》，摹拓之本后被宋理宗藏于内府。到元代至元年间，内府秘藏散出，余姚翰墨堂刻本诸帖流落民间，曾被著名学者陶宗仪所见，于《兰亭集序摹本》上亲题“真传世之宝也”。《南村辍耕录》中亦记有此事。在兰亭雅集之时，有玄言诗大家孙绰亦写有《兰亭诗序》，也是一篇不错的佳作，只因书法不及王羲之，遂被王羲之所掩。直到1008年之后的元代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初三日，在余姚又举行了第二次文坛盛会——续兰亭会。

元至正二十年，正是红巾军等群雄纷战，反抗元朝统治，战火频仍的时期。当时有军阀方国珍占据浙东，改变先前高傲的态度，折节下礼，屈己待人，招延士大夫，想与中吴争胜。一时间不少著名的文人学士如林彬、萨都刺等都归依到方国珍帐下，方氏军营之中文风特盛。这时有刘仁

本，以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的身份辅佐方国珍。至正二十年春，刘仁本到余姚修整军队，即在余姚县衙内的秘图山前秘图湖旁，聚众雅会。秘图山是余姚县衙内的一座小山，高仅20来米，东西百余米，南北五六十米。山虽小，但山岩奇特，洞壑相贯，小巧玲珑。因它小，又称之为方丈山。山的南麓有小湖，称之为秘图湖。刘仁本即于此仿照会稽兰亭景物做了一番精心布置，疏流泉，筑曲水，植卉草，种篁竹。并建亭一座，以孔子学生曾点“春服既成，童冠浴沂，舞雩咏归”之意，取亭名为“雩咏亭”。招集当时名士赵俶、谢理、朱右、僧悦白云、王霖、朱纲、僧阜、徐昭文、郑彝、张溥、僧福报等42人，会聚于秘图湖边，曲水流觞，赋诗品酒，行修禊之事，志各人之乐。这一天，同样是天气清淑，日影明丽，众名士或饮或醉，或咏或歌，徜徉容与，咸适性情之正。当时依然叫每个人按照晋人兰亭修禊原诗之韵，再赋诗唱和。众名士怕遭罚酒之耻，均不敢落后，即时濡墨挥毫，口吟笔书，过不多久，即都交了卷。事后即将这些诗作汇总，请四明篆刻大家胡仲瑛镌刻于石碑，由江浙行枢密院都事谢理篆额。碑高1.27米，宽0.6米，碑分4行，第一行为图，水石竹木，极尽秀润；中有方池，引以为曲水，池之上即雩咏亭，亭旁为高风阁，旁刻题字。第二行即刘仁本撰《续兰亭诗叙》，以及他人的叙补。第三、第四行即诸人所赋诗作。后人称之为《续兰亭会图石刻》。

刘仁本在《续兰亭诗叙》中写道：“东晋山阴兰亭之会，蔚然文物衣冠之盛，仪表后世，使人敬慕不忘也。当时在会者，琅琊王友、谢安而下凡四十二人。……余有是志久矣。适以至正庚子春，治师会稽之余姚州，与山阴邻壤，望故迹之邱墟，而重为慨叹。于是相龙山之左麓，州署之后山，得神禹秘图之处，水出岩罅，潴为方沼，疏为流泉，卉木丛茂，行列紫薇，间以篁竹，仿佛乎兰亭景状，因作雩咏亭以表之。维时天气清淑，东风扇和，日景明丽，实三月初吉也。合甌越来会之士，或以官为居，或以兵而戍，与夫避地而侨暨游方之外者，若枢密都事谢理、元帅方永、邹阳朱右、天台僧白云以下，得四十二人，同修禊事焉。著单袷之衣，浮羽

觞于曲水，或饮或醉，或咏或歌，徜徉容与，咸适性情之正，而无舍己为入之意。仍按图取晋人所咏，诗率两篇，若阙一而不足者，若二篇皆不就者，第各占其次补之。总若干首，目曰续兰亭会，殊有得也。嗟乎！自永和至今，上下宇宙间，千有八载，遗风绝响。而今得与士友俯仰盘桓，追陈迹，修坠典，讲俎豆于干戈之际，察鸢鱼于天渊之表，乐且，夫岂偶然也。是虽未能继志曾点，然视晋人则亦庶几已矣！独未知后人又能有感于斯否乎？会人请纪，以冠诗端，而诸姓名则各因诗以附见如左。”

此碑刻经历元代至明、清，供人观摩，完好无损。至清乾隆年间，曾由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摹拓后赠予另一史学家钱大昕，由钱大昕题跋于图末，并被钱大昕收录于《潜研堂文集·金石》卷中。

刘仁本（？—1367），字德元，与方国珍同为黄岩县人，元末考中进士乙科，历官浙江行省左右司郎中，与张本仁同入方国珍军幕。元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和兄国璋、弟国瑛聚众数千人入海，打劫漕运粮食，横行海上。元朝廷多次招降方国珍，授以行省参政、海道运粮漕运万户之官职。方国珍割据温州、台州、庆元三路，遂据有浙东，日益强大，与朝廷抗衡。当时，不少名士会聚在方国珍幕中，刘仁本即时常与他们赋诗唱和，有较高的知名度。当朱元璋占据江淮地区，元朝廷要方国珍从海路输送军资北上，方国珍即派刘仁本负责军需物资的海运任务。当朱元璋攻取婺州，招降方国珍时，方国珍假意归附，献上庆元、温州、台州三郡，任福建行省平章事之职。实际上方国珍阴持两端，仍向元朝廷输送军粮不止，并接受元朝廷的江浙行省左丞相的官职。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派参政朱亮祖攻下台州，进克温州，方国珍率舟船遁逃入海。朱亮祖俘获刘仁本，朱元璋怨恨刘仁本归附方国珍，不肯投降，即用皮鞭猛抽刘仁本，致其遍体鳞伤。后因伤处溃烂，不治而死。十二月，方国珍被征南将军汤和追败，才归降于朱元璋，浙东战事才得以平息。

元人的续兰亭会，同晋人的兰亭会一样，均可被称为中国文坛上的两次盛会。

《续兰亭会图石刻》碑原竖立在龙泉山龙泉石井下方“劳寿小园”中，假山石笋，奇花异草，小巧玲珑。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现在只能按旧《绍兴府志》及旧《光绪余姚县志》的记载去想见它的风貌了。

四明山游历与撰述

四明山作为浙东名山，道家圣地，不仅风光奇丽，有奇峰秀谷，云树烟草，飞瀑流泉，还有盘萦于山巅水涯间的诗意词境、仙家传说、奇珍异宝；又是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历代名人学士游历不绝，留下了极多的诗词墨迹。有多人编纂有关四明山的志书，现已大都不存。

最早把四明山纳入笔墨的，有史可考是汉代寿春人梅福撰写的《四明山记》。梅福字子真，为西汉后期的道学名士，《汉书》卷六十七有传。梅福少年求学于长安，曾任南昌县尉。西汉末年，外戚王氏控制西汉政权，大司马王凤当权。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皇太后之侄王莽被封为新都侯，朝政日非，民怨四起。梅福忧国忧民，以一县尉之微官上书朝廷，指陈政事，并讽刺王凤，因“妄议朝政”，险遭杀身之祸。因此梅福挂冠而去，隐居于南昌城郊之南，弃官遁避尘世。

公元8年，王莽篡位称帝，改国号曰新。梅福为逃避王莽的挟嫌追究，游历江湖，从江西九江来到四明山隐居，行医舍药，救治百姓。余姚名士严子陵曾拜梅福为师，对道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梅福见严子陵好学有才，就把第二个女儿嫁给了他。而梅福隐居过的一座山也被称为“大梅山”，即现今梁弄的东明山。据《云笈七签》载道教相承次第，太上老君为第一代，严子陵为第十五代，严子陵之女为第十七代。晚年的梅福最后来到普陀山隐居山洞修行炼丹，后死于洞中，山民为纪念他，于梅福隐居遗址建梅仙庵（梅福庵），至今香火兴旺。梅福编撰《四明山记》久佚不存，清代宁波徐时栋却云：“此书当尚在《道藏》之中，二先生（黄宗羲《四明山志》、全祖望《句余土音》）尝读《道藏》，故能引之如此，而余则未之见也。”（《四明六志校勘记》卷九）梅福撰《四明山记》的存或佚，就成了地方史志上的一个谜。

梅福之后，有晋代广川辞赋家木华撰《四明山记》。木华字元虚，这

位在众多诗词家中并不算出名的墨客，著有《海赋》，气势磅礴大气，壮丽多姿，史称“文甚丽，足继前良”。而他写山的篇章，则当数《丹山图咏廿四首》，收录于《道藏》中，有贺知章作注。他从“四明山名赤水天，灵踪圣迹自天然。二百八十峰相接，其间窟宅多神仙”，写到“周围盘广八百里，古来灵瑞难遍记。梅福为仙居此山，刘纲作宰妻樊氏”，足足写了24首，几乎囊括了四明山之最美。他写的《四明山记》，却已久佚不见。在《四明六志校勘记》卷九中说道：“宋僧赞宁所作《笋谱》，曾引木元虚此书。此记今亦不可见。”

隋唐以来，数百人游历四明山，大溢其美。其中有李白、刘禹锡等大家，更有一位隐居四明山的道士谢遗尘拜访陆龟蒙，大谈四明山之壮美幽秀。陆龟蒙为之憧憬，当即撰作《石窗》《过云》《云南》等9首诗，好友皮日休看后，即提笔撰作《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首》与之呼应。陆龟蒙和皮日休足迹虽不曾踏过四明山，两人却因唱和而留下描述四明山的“九题诗”，给后人以无穷的遐思。宋代诗人孙应时的《四明山记游八十韵》，竟然多达“八十韵”千字文，当真是饱蘸浓墨，淋漓尽致，堪称人文奇谈。后世黄宗羲、高士奇、李暉、全祖望等纷纷“追和”，吟咏不绝。

又有无名氏撰《四明山记》一卷，见《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一著录，今不复可得。乾道《四明图经》及宝庆《四明志》皆征引此记，说明曾有过此书。

这里有两位喜好山水的先贤进四明山游历，值得一记。

元末明初，有徐本立、戴良、顾园、吴温夫、汪复初、汪居安、宋僖7人，进四明山游观，后有顾园成《丹山纪行图》，以记此游历。据卷首画者顾园自题“丹山纪行”和卷后徐本立撰书《游丹山记》，可知此行详情。洪武四年（1371）十一月，吴温夫、汪居安自会稽山阴经上虞小山，到余姚与徐本立相会，相约7人做四明丹山之游。次日出发，经过梁弄建隆岙方山京的状元坊，溯溪东行3里许，至白水冲瀑布，夜宿白水宫石田山房，其弟子赵集玄侍立，遂作《丹山纪行图》，次日由鄞峰而南，过徐家

岙、小柿口，渡黄溪，越大岚（兰）诸山。

由元代画家句吴顾园创作的纸本设色画《丹山纪行图》极有价值，画中除了卷首有画者顾园自题“丹山纪行”，卷后有徐本立撰书《游丹山记》，后面还有银塘杨彪，余姚赵谦，蕲阳朱坦翁，括苍王霖，余姚赵宜生，余姚范玄凤，会稽毛锐，余姚宋僖、吴居正、范骥、顾文彬等学人所作题诗，或五言或七言不等，题的时间也有先后，均有各自特色。此图现收藏并展出于上海博物馆。

时隔140多年后，又有王阳明进四明山游历一事。正德八年癸酉（1513）正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遂乘机便道归省，与升任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员外郎的妹夫徐爱同舟相伴南下，二月，回归余姚。王阳明本打算至家即与徐爱等同游四明山，后因宗族亲友因事相绊，弗能行。到五月终，与徐爱、王琥、许璋、蔡宗兗、朱节等从越城来，遂开始厥游。而蔡宗兗忽疾，乃返棹。一行6人乘潮西上通明江。次日，达上虞（丰惠城），许璋、蔡宗兗因疾辞去。其余辈4人入四明，乃夜逾金沙岭、黄竹岭。次日晨抵四明乡梁弄汪巷村访汪克章。汪克章遂陪同阳明一行5人同游四明山，观白水瀑布，探潺湲洞，趋羊额岭，翻越大岭，过下管，抵妲溪溪口。时朱节伤足，王琥因病，不得已退出游览。阳明先生一行尚剩徐爱、汪克章与先生3人，遂趋韩采岩，沿赤水溪向东，暮抵“四明山心”杖锡寺，经蜘蛛岭、徐凫岩，入雪窦寺，游隐潭，登上千丈岩以望天姥、华顶。然后从奉化取道，乘舟沿奉化大溪至宁波。七月二日，乘船还余姚。事后，由徐爱撰成《游雪窦因得龙溪诸山记》，对此行有详尽记录。《王阳明年谱》八年癸酉条下对此亦有载录，并说明“先生兹游虽为山水，实注念爱、馆二子。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

至清初，又有余姚黄宗羲撰《四明山志》9卷本，现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吴门黄氏刊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明丛书》第四集本。《四库全书》据江苏周厚培家藏本存目。现收入于浙江古籍出版社版《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有黄宗羲自序。此书《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关于黄宗羲撰写此志之前曾游历四明山，详见诸焕灿撰写的《黄宗羲与〈四明山志〉》。

四明山风光独特，可使人流连忘返。遗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更在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一定比物质更长久、比时空更永恒的东西中有诗词志记墨迹，可让后人吟咏、记忆、畅想。

姚江古代科技

自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等而下之，姚江流域的古代亦无科学可言。其实此说错误。

中国最初接触的“外来科学”就是西方发展的近代科学。由于受18世纪法国唯物流派的影响，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科学才是科学。法国唯物流派认为以前的一切都是迷误，人们也认为以前对自然界的认识都是荒谬的，不是科学。在这数千年的荒谬堆中，可能只有古希腊的少数创造，比如欧氏几何等可以称为科学。人们根据这样的科学，特别是根据近代科学中类似欧氏几何的模式制定了科学的定义，比如，必须有一套严密、系统的理论等才是科学。然而这一定义有着许多失误，用此定义来衡量近代科学，也有许多难以符合这个定义。许多人用这一定义来套中国古代的科学，自然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够不上科学的标准，只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也有人认为，科学等于正确，谬误的东西不是科学。然而，近代不少后来的科学发明同时也否定了早些时候的科学论断，证明不少近代科学是谬误的。这同样说明：科学不等于正确。正如库恩所说：科学家所用的理论范式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发展着的对自然界的认识，它的判断也仅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同样，我们姚江流域也是有科学的。即使它不那么系统，理论不那么严密，但也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不仅有科学，也有科学成就，还有科学精神，所缺少的仅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方法而已。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的人文和科技就已经同时显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从《尔雅》的记述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其中尤以数学、天文历法、农学、中医药学4门基础学科最为发达，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最为世人所称道。但是，自秦汉以后，统治阶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

不够，以及知识分子普遍重文轻技的倾向，造成了传统文化研究对科技文化的忽视，致使科技文化的研究十分薄弱。除天文历学者的地位稍高一些之外，其他科技工作者的地位十分低下，二十四史中基本没有科学技术人物传记，即使有的话也是以其他的身份出现，即如张衡、祖冲之就是以史官、文学家的身份而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入传的，虞喜是以儒学的身份入传的。虽然科技文化并没有停止它的发展和创造，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统学术中的研究地位则远不及人文文化显赫。

然而，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是辉煌的，姚江流域的科技成就也是辉煌的。本文就从姚江流域范围来考索一下古代科技成果，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天文历算

天文学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古代科学。姚江虞氏世习《周易》兼及天文历法的研究。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就有虞翻（164—233）写《易律历》，用《周易》与天文历法相结合进行研究。虞翻之子虞耸继承家学，也著写《穹天论》。他结合早先的浑天说与盖天说，提出天穹窿如鸡蛋，中间充满元气的穹天说理论，是吴末晋初比较有影响的天体结构学说。

到东晋时期，又产生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虞喜。虞喜（281—356），字仲宇，一生潜心学问，淡于功名利禄，除担任过短暂的郡功曹小官外，朝廷、州郡屡次征召、察举，都被他所拒绝。他隐迹于大隐山中，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精研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博闻强识，潜心经学和天文学的研究。他的经学研究得到了时人的推崇，有“经学大宗”之称。他最主要的成就在于天文学。首先，他在早先的浑天说、盖天说和宣夜说等多种天体结构学说的基础上，经过比较、思索，写成了《安天论》，认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的形状处于永久安定的状态，而下面的地体也保持静止不动，方则俱方，圆则俱圆，“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

更为突出的是他经过对天象的长期观察，还发现“岁差”。由于太

阳、月亮和行星对地球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引，地球自转轴的方向不断发生微小的变化，使冬至点在恒星间的位置逐年西移，每年的移动值就叫作“岁差”。虞喜之前，所有的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现象，大家都认为一个“恒星年”正好是一个“回归年”，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环行天空一周后，到明年冬至又回到原来位置上。虞喜经多年观测之后，发现第二年冬至时节的太阳并没有回归到去年冬至时节的位置上，地轴运动引起冬至点向西缓慢运行，产生回归年比恒星年短的现象，虞喜即把这一“每岁渐差”的现象称为“岁差”。后又经过仔细观察计算，得出“五十年退一度”的结论，即每50年冬至点在黄道上要西移1度。欧洲人发现这一现象还是在17世纪80年代牛顿力学理论问世之后，虞喜的发现比西方早了1300多年。虞喜是我国第一个发现和研究“岁差”的学者。清代学者阮元说：“古无岁差，有之，自虞喜始。”这是天文学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它促使历法制定日趋精密准确。

虞喜发现“岁差”的100多年之后，南北朝祖冲之编制《大明历》时，就把虞喜所发现的“岁差”引进历法，正确地区分恒星年和回归年的细微之差。虞喜在天文学上的重大贡献，已引起今人的重新评价，他已被认为是世界科学史上著名的学者。他的突出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到清代初期，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1643—1709），字主一，是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者。黄百家成年之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从事学术活动。他除了继承父志续纂《宋元学案》之外，在数学、天文、农业方面也有较大的成就。他重视西方的自然科学，不仅自己尽力借鉴，还尽力介绍，这对当时淡漠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在《黄竹农家耳逆草·天旋篇》等著作中把西方近代科学家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太阳黑子运动、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分类学说及其他的先进科技知识如望远镜测天技术、显微镜、摄影镜等9种光学仪器，以及气象学等介绍到中国。并把明廷聘任的意大利著名科学家利玛窦写入《明史·列传》中。

他还在《明史·历志》中详尽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中的“蒙气差”现象。在批判古人“不谙历理之谈”的同时，肯定了“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的传统观点，对《明史·历志》的修纂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之后又有邵昂霄（？—1736），字子政，他除了擅长琴棋百艺文章之外，尤精于天文历算、推测演算。雍正十三年（1735），浙江举行贡生先拔考试，成绩优异者8人，而邵昂霄所写即是《算学原理》和有关中西历算方面的文章，万言立就，受到考官的极大赏识。不久，学使帅念祖到金华主持考试，特请正在金华做客的邵昂霄撰述有关天文星象的《婺州分野形势》。邵昂霄当即展纸挥写，一直写到晚上，全稿长达8卷，他也被帅念祖称为“天下奇才”。乾隆元年（1736），经浙江总督管巡抚事程元章推荐应博学鸿词科。考完之后，离京游岭南，客死江西舟次。邵昂霄学冠两浙，著述丰富，其主要代表作有《万青楼图编》，专论天文、算数之术，分天体、仪象、宫度、测时、定时等目，皆援引汉晋以来天文学上的精华及西欧科学家言，并附以己说，颇有所得。他观测天象所用量天景尺及漏碗诸法、仪象等，悉自行研制，亦颇精密。另著有《中西历考》。

清晚期，有黄炳堃（1815—1893），字慰亭，是黄宗羲的七世孙。他自少年读私塾时即有志于天文历算之学。成年后，即写有《两太捷算》《交食捷算》《五纬捷算》《历学南针》《麟史历准》等多种历算著作。由于黄炳堃学有所成，有多所学校聘他任教，黄炳堃考虑到先祖黄宗羲同甬上学人的关系，仅接受了宁波知府宗源瀚的邀请，到宁波参与创办“辨志精舍”（当时宁波高等学府），主掌天文历算学斋，长达10余年，为浙东地区培养了众多的天文历算人才，开创“浙东算学”学派。

为观察天象，黄炳堃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居室（余姚北城管家弄内）西北建藏书楼“留书种阁”，阁共3层，人称三重楼，最上层为观象楼，内设星亮台，卧床对空，用玻璃设窗，直透天象。床用摇板放下，与坑几差不多。黄炳堃每于晴空夜晚仰卧观看星象，记录查考。黄炳堃曾写有《述怀诗》说：“观象楼高月正明，从今有暇倚前楹。抗心撰述千钧

系，撒手功名一叶轻。晤对古人书万卷，测量天度夜三更。余生幸享清平福，珍重西山夕照明。”从诗中可知，黄炳堃整天身居阁中，日读古人书，晚观夤夜天，或则身倚留书种阁前楹，凝神静思，踱步巧算，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天象观察记录。

医学

中医学历来领先于世界，只是到近代，西方医术发展并传入我国，才使中医学退居二线。但大家同时明白，西医治表，中医治本，中医的药物原理仍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在去病强身上自有它的特色。

早在东汉后期，经学大师虞翻任东吴孙权的高级谋士。他不仅精于《周易》的研究，更不信神。按《三国志·虞翻传》载，一日，孙权与张昭等论及神仙，虞翻当着孙权之面指着张昭骂道：“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他还精通医术，当东吴虎威将军领都督事的“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堂堂东吴大将尚请虞翻治病，可见虞翻医术的高明。到宋代，姚城内外不乏精通医道者，如“姚江官人宅王氏”中的王俣著有《本草单方》35卷，“取本草诸药条下所载单方，以门类编之，凡四千二百有六方”。程迥有《医经正本书》8卷，“专论伤寒传染，以救薄俗骨肉相弃绝之敝”；张永尤为著名，他以医术为翰林医官，著有《卫生家宝小儿方》传世，子孙亦大多以行医为业。他的八世孙张经，挟祖传医术周游甬、越之间，经他医治的甚众。张经四世孙张廷玉，任太医院使，亦精医术，还善按摩之术；后有项昕徙居余姚，向张廷玉学医，得传其术，以医名世。南宋著名理学家孙应时自创一种导引之术，有去病健身之功效，人多习之。此外，尚有许举仲善于治痘；苗仲通对疑难杂症尤有心得，世有奇疾者，得他诊治则愈，著有《备急救人方》8卷，备载其他医书所不载的奇方。

明清时期，姚江两岸涌现不少较有声望的医家，成就最著、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滑寿。

滑寿（1304—1386），字伯仁，号揆宁先生，元明之际的著名医学

家，尤擅长于带下医（妇科），有东南名医之誉。他曾拜京口名医王居中为师，悉心精究方脉，研攻岐黄之术。学成之后，一路行医来到余姚。他一进余姚城，就以高超的医术救活了一位因难产而假死的产妇，被余姚百姓留住，自此落籍余姚。他早年向王居中学医时，发现《素问》《难经》两部古医书“辨析虽博，而缺误多”，就向老师提出：“《素问》详矣，多错简。愚将分藏象、经度等为十类，类钞而读之；《难经》又本《素问》《灵枢》，其间荣卫藏府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误亦多。愚将本其义旨，注而读之可乎？”王居中听后非常欣慰，予以积极支持。滑寿对两书重加考订，详加注释，纠正谬误，写成《素问钞》12卷和《难经本义》2卷。他还学习钻研张仲景、刘守贞、李明之诸医家之所长，医术锐进。之后，他又向东平高洞阳学习针灸，经过临床实践和探索，认为：“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唯督任二经，则苞乎腹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他根据《内经骨空》诸论及《灵枢》中所述经脉，重新查正考订了人身上的647个穴位，写成《十四经发挥》。他用针砭法治疗难产等多种疾病。治疗中，针灸和药剂并用，辄奏奇效。他还写有《麻疹全书》，书中提出诊断小儿早期麻疹可用检查口腔黏膜斑的方法，后来被中医称为“滑氏斑”。这一发现要比西欧早几个世纪，是世界重要医学成果之一。他的医学著作甚丰，除上述之外，还有《诊家概要》《滑氏脉诀》《读伤寒论钞》《痔痿篇》《医韵》等17种之多，均流传至今，为古今医家临床所用，皆有功于世。洪武六年（1373），越州推举贤才两人，其中一人即为滑寿，但被他坚辞以避。

滑寿不仅医术高明，高尚医德更为后人所赞颂。他看病不问贫富，若遇贫困的病家，还甘愿奉送药物或药资，极力设法为病家解除危难。到洪武十六年，滑寿披发策杖，弃家人山，筑一座竹楼用来居住，名为“吾且休楼”，过起了回归大自然的生活，不复过问人间之事，尤不喜欢面见高官贵人。时有致仕布政使孟骥等人山求见，每因竹楼扃闭而无法登门瞻颜。洪武十九年去世，年83岁。

当时，在医学上较有成就的尚有滑寿的弟子骆则诚、吴温夫。此外还有长于内科的严叔信，工治胸肺的孙天弼，善治痘症的沈照，长于外科的朱孔孟，治疾奇中的桑天显，以及御医赵世美，太医院判李乐任。另外朱舜水族中就有朱志仁、朱浚、朱锴、朱升年等多位名门医家；黄宗羲之弟黄宗炎亦有着高超的医术，当抗清斗争失败之后，曾手提药笼行医东西两浙为生。黄宗羲还派儿子黄百家向鄞县名医高旦中学医，康熙二十年（1861），余姚痘疫流行，黄百家即向浦阳傅商霖学习种痘仁术，使患痘症儿童免遭厄难。黄百家还鉴于此次治痘症经验，写有《天花仁术序》，记载了浙东种痘术流行大概，而且保存了我国最早系统阐述“痘本胎毒”的病因理论。黄宗炎的儿子黄百谷随父业医，撰有《难经注》《本草注》《素问注》。不少医家还根据自身行医的经验，撰有医著，如黄渊的《难素笺释》《本草考证》《针经订验》；周铖的《香远居医学举要》，详明药品功用并脉诊治法；严洁、施雯、洪炜并称“姚江三医家”，凡险恶奇症，3人共研，施药每获速效，3人共辑《盘珠集》丛书。张琳的《医说妙方》，邵讷的《易简经验方》《本草摘要》，黄济之的《本草权度》；姚北周巷景氏家族的景瑞璇、景炼之父子精于小儿科，处剂投药，每多奏效，还著有《幼科诊治真传》《医学新知》；邹上骧的《历科传书选》，徐自俊的《痘症论要》，夏承天的《医学考镜》。

多学科的研究

在姚江流域，古代更有越窑秘色瓷的研制，为五代以来陶瓷史上空前启后的杰作。“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秘色瓷的情况自有众多文献记载，有众多专家专题研讨，本文不予细述。

另外，姚江两岸还有高似孙的砚石研究。在宋代，人们对砚石用材极为关注，由此而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岩石矿物学知识，高似孙即对砚石予以研究，撰写《砚笺》这一砚石研究的专著。

朱舜水作为一位中日友好交流先驱，在寓居日本期间，不仅向日本学人传授学术文化，还向日本人民传授中国各种较为先进实用的日用科学技

术知识和技能。他按照记忆，仿照余姚孔庙的格局，为日本设计制作《学宫图说》，亲自设计学宫建筑图和制作模型，悉心指授日本工匠，在江户（东京）建成日本的孔庙。他还为德川光国藩主设计建造著名园林“后乐园”。“后乐园”至今仍保持清幽古朴的风貌。他还为日本传授了器用、礼器、学舍、民宅、缝纫汉式衣服、建坟、制碑、制棺、草木种植等多种工艺技艺。上述情况现均保存在《朱氏舜水谈绮》一书中。

学问家黄宗羲不仅在文史方面给我们留下大量的宝贵财富，他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为我们开启了先路，为近代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他一生长期坚持自然科学的研究，撰写20余种科技著作。今大部分散佚不存，从幸存的史料中尚可看出黄宗羲的科研成果。早在青年时期，黄宗羲在京师遇到西人汤若望，即接受汤若望西历算法的指导，信从天地两圆之说。日后黄宗羲即添置“汤若望日晷”，作为测日工具。正如黄百家所说：“先遗献于明末时，曾与泰西罗味绍雅、汤道未若望定交，得其各种抄刻本历书极备。”可以说黄宗羲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走上研究天算道路。

黄宗羲在天算、地理学、乐律、动植物等诸多研究中，给我们留下大量成果，天算方面有《西历假如》《春秋日食历》《气运算法》等10余种；由于他对历算有着高深造诣，曾为《明史·历志》的修纂提供了不少积极建议，还实际供稿给史局，为《明史·历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地理学方面，他通过踏勘、观察，写有《四明山志》《匡庐游录》《今水经》等，为水文地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区域地理诸多方面开启了一代新学风。在乐律方面，黄宗羲要求引入数学计算方法来研究乐律，表明他对数学方法和实验手段在科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并写有《律吕数义》《律义新义》。

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自然科学的道路，他在《复陈言扬论勾股书》中曾说：“家大人于三十年空山推步，凡百数学，俱有成书，弟不过于家大人中窃演成法，知天地间有此一种学问耳。”他不仅

有如上文所述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在数学、生物等领域也有深含创意性的探索，著有《勾股矩测解原》。同时他对水利测绘、家鸭的人工孵化、除草技术、茯苓的人工栽培、人工培育鸡冠花新品种等均有着较深透的研究。还有黄宗会在《西塘筑圃记》中提出的对棉花种植采用“开沟作畦”的技术，是当时浙江棉花种植的“最良法”，大大提高了棉花的产量。

此外，时至近代，还有胡德辉的中西历算，叶谱人的数理科。叶谱人亲手制作“新欹器”贮水器、“新阳燧”聚光取火燃物镜等，由于他在数理科方面的成果，曾被绍兴府学堂聘为数理科教员，与鲁迅先生同校任教。他不仅参与编写民国早期的中学教科书，他所撰写的《平三角大要》《代数问题详解》又成为教学上的主要参考书。民国十年（1921），他担任慈北锦堂中学校长，培养了大量数学人才，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古典声腔“余姚腔”

早在唐宋时期，浙东已经成为戏曲之乡。唐代有参军戏，唐元和年间（806—820），女艺人刘采春及其夫周季崇善弄“陆参军”。元微之赠刘采春诗有“选词能唱望夫歌”句。刘采春所唱120首，皆当时文士所作。今尚存《罗唖曲》6首。时至南宋，主要演出诸宫调及杂剧，曲艺则有鼓词。洪迈《夷坚志》载有越地演唱诸宫调的内容。杂剧流行于越州民间，或为祭神而演。王十朋《梅溪集》中有“剡之市人，以崇奉东岳为名，设盗跖以戏先圣”等语。鼓词为宋时越中主要曲艺形式。陆游有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叙“拊鼓盲翁”说唱蔡伯喈故事的情状。其时，绍兴府属地区城乡演出活动频繁，陆游晚年回绍兴里居所写诗中，多有咏及。当时，已有本地的“村伶”，村伶还组班演出。这种演出，为不误耕作，多在夜间，极受农民欢迎。陆游诗云：“老伶头已白，相识不论年。时出随童稚，犹能习管弦。”“野寺无晨粥，村伶有夜场。”“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戏文入元，与北曲元杂剧对称而名为南戏。

浙东地区本是堕民聚居的地方。对于堕民的产生，有好多种说法，这里不做探讨。几百年来，堕民一直被视为“乐户”、贱民，不得应科举，不得与平民通婚，也不得移出堕民区，只准任婚丧喜庆杂役，直到清雍正时才削籍，与平民同列。也许因这堕民的祖先来自全国各地，西部秦地人也不在少数，所以从这里衍生出的“余姚腔”，或许与秦腔也有一定的关系，才形成此剧善于表达悲壮、慷慨激昂的情感。加上唱白通俗易懂，表演风格粗犷豪放，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宋、元时期，有一种用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它以民间歌舞为基础，由民间小曲融合宋词的声韵，富含江南“顺口可歌”的特色，吸收杂剧、诸宫调、唱赚以及宋词的艺术成就，迅速流布于南方各地，这就是“南戏”，南方人把它称为“戏文”。南戏在形式上比杂剧要自由得多，内容可长可短，声韵不受宫调的严格限制，显得较为灵

活；音调节奏大抵舒缓婉转，适合南方人的柔情，为南方群众所乐于接受，在东南地区大大地盛行起来。然而在元代，由于民族压迫十分残酷，统治者把居住在国内的各族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而南人被列为最低贱的一等。南戏流布的地域是以浙江为中心，逐渐蔓延到福建和江苏的，正是南人活动的区域。而浙江又是反抗元代统治者最为激烈的地区，元代统治者为了扑灭人民的反抗怒火，实施军事镇压，派军队驻守在重要地方，仅在浙江一处就有军事据点100余所。面对这样的局势，南戏的发展必然受到极大的阻碍。再加以元统治者喜好杂剧，随着元代政治、军事的统治势力在南方的扩张和巩固，杂剧在南方剧坛上也就“一时靡然向风”，盖过了南戏。正如明代朱肃在一首《元宫词》中所说：“江南名妓号穿针，贡入天家抵万金。莫向人前唱南曲，内中都是北方音。”（清·钱谦益《列朝诗集》清顺治刻本）某些文人也把南戏看作“亡国之音”，而把北曲看作“治世之音”。（周德清《中原音韵·前辈余论》），南戏一度在剧坛上受到歧视。

到元末，元代在南方的统治地位开始动荡，杂剧的支配力量也随之发生动摇，南戏遂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整个姚江流域，由于盛行各种庙会、春社、秋社、乡村宗祠、关帝会、迎城隍等民间风俗活动，每遇各类活动必然演戏，以活跃气氛，娱乐群众，使得歌舞唱曲特别兴盛。如《光绪余姚县志·风俗》载：“（正月）十三日灯节，邑庙演戏，城乡大姓宗祠张灯设供，罗列珍玩，杂奏音乐，游人彻夜……（五月）十三日，关帝生辰，里社亦多拈香赛戏……四月两城赛神，尽一月而罢，名曰甲戏……九月十二日，两城秋赛，迎城隍神，农复留佣刈晚禾。冬至前后各乡村祠庙鼓乐演剧，名曰堂戏。”（《光绪余姚县志·风俗》卷五，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亦如黄宗羲在《姚江春社赋》中所写道的：“岁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乡贤，留城东数日，值赛神之会，举国狂游……城东五里，有庙巍然。十六之日，四方毕瞻，厥队维百，一队数千，盖十万人，于此周旋，红尘四合，歌吹沸天……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陆从舟，施轮暗转，孤鹑旦末，乐工不选，乃命稚女充赋，粉子蒙遣，沔珠椹

艳，神心缱绻。至若夜以继昼，素月流天。士女杂沓，灯火连延。”（《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十册第617页）“宗祠内每年演戏一夜以敬宗祖。”（《余姚峙岭沈氏宗谱》清刻本）就在这一基础上，以余姚地方曲调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历史上称之为“余姚腔”，因余姚历来归属越州（绍兴府），又可称之为“越曲”或“越腔”。它与随后兴起的“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并列为南方古典四大声腔。

首先必须说明，“余姚腔”不是“余姚滩簧”（姚剧），“余姚滩簧”仅仅是近200年间刚由明、清俗曲及曲艺演变而成的新兴声腔。而“余姚腔”源远流长，早在明代前期就已发源于余姚境内，形成于整个绍兴府区域，是一种具有浓郁浙东地方特色的戏曲声腔。据戏曲史专家钱南扬先生考证，“余姚腔”可能源于宋代，但尚缺乏有力的证据。

“余姚腔”的名称，最早见于明成化年间曾任浙江右参政的陆容（1436—1496）《菽园杂记》一书：“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为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菽园杂记》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页）几十年后，绍兴徐文长（1521—1593）在《南词叙录》中又写道：“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徐文长生活在嘉靖年间，于此可知，“余姚腔”于嘉靖年间即已传唱于绍兴、杭州、镇江、济南、济宁、池州、当涂、扬州、凤阳、徐州、南京等地区，是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四省群众所喜欢看乐的声腔剧种。这里还得说明的是，王阳明是余姚人，也深深喜爱“余姚腔”。当他贬官贵州龙场驿时，跟随他的童仆由于水土不服而致病，王阳明“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8页）。笔者前几年亲赴贵州修文县（原龙场驿）考察时，当地群众告诉我，贵州与余姚相隔遥远，语音不同，由于王阳明曾向这里的群众教唱戏曲，故此至今贵阳

地区的群众尚能哼上几句越曲，唱越曲时还往往带有越音（余姚地方音腔）。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生活的明正德年间，“余姚腔”已是影响广泛的声腔，上自士大夫，下至群众，都多少能唱上几句“余姚腔”。并由于王阳明贬官贵州，把“余姚腔”亦带到了贵州地区，为当地群众所学唱。由于“余姚腔”的兴盛，余姚一地还出了如孙矿、孙如游、叶宪祖等多位戏曲作家，更有戏曲理论家吕天成和他的《曲品》，影响广远。

“余姚腔”受到如此广大地区群众的喜爱，与它的声腔特色有关。

“余姚腔”的特色：第一，由于受到北方杂剧的影响，“余姚腔”以会稽余姚地方曲调为主，融合了不少北曲的成分，为长江、淮河中下流域广大群众所接受；第二，它以清唱为主，仅以小音量的打击乐器伴奏，演唱时使听者清心，无嘈杂之感；第三，唱口比较平稳柔和；第四，音调低缓轻软，抒情色彩较浓；第五，不受场地限制，可在广场及各种社庙中临时搭台演出；第六，采用后台帮腔伴唱，韵味悠长；第七，不用曲谱，按律入调；第八，演唱和说白中，时而插唱“滚调”。它有许多至今不常见的曲调，如“金钱问卜”“急急锋”“意玄玄”“琵琶煞”“侧字令”“浪中船”“鹅儿叫”“四时春”“遮幕纱”“灯火窗”“闹更歌”“桃花浪”等等，这些曲调当来自余姚地方小调，可惜至今尚未获悉它的源头。

由于“余姚腔”传唱地域广大，戏班众多，曾使不少演员闻名于大江南北。嘉靖时著名戏曲家李开先（1502—1568）曾将唱“余姚腔”的演员分作“善弹不善唱”与“善唱不善弹”两类，他说：“如余姚董鸾、丰县李敬、谷亭王真、徐州邹文学、济宁周隆、凤阳张周、钱塘毛士光，皆长于歌而劣于弹……统而较之，毛秦亭（毛士光）南北皆优，《北西厢》击木鱼唱彻，无一曲不稳者。鸾（余姚董鸾）则妆生，做手尤高。”（《词谑·词乐篇》）李开先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此众多的“余姚腔”民间艺人集合在一起，按原文、原句演出王实甫的《北西厢》和马致远的《汉宫秋》等若干折目，正说明了当时“余姚腔”演出的盛况。它不仅为广大群众所爱听，还为许多文人学士所传观。直至晚明，戏曲作家阮大铖专门养有一个戏班子，戏班声腔教师臧亦嘉，余姚人，亦是一位善唱“余姚腔”

的名家，当时南京秦淮河上的寇白门、顾眉、李十娘、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杨宛叔等十大名妓除了唱“昆曲”之外，亦向臧亦嘉学唱“余姚腔”。

“余姚腔”流传到安徽池州、青阳一带，遂与流行于该地区的“弋阳腔”（元末明初，南戏西进沿信江传入弋阳地区，与弋阳本地民间音乐相结合而成弋阳腔）及当地民间曲调汇合，演变形成后来的“青阳腔”。据程演生在《皖优谱》中说：“皖南优人，是时所习者为‘余姚腔’。”

《歙事闲谭·歙风俗礼教考》载：“明万历廿八年（1600）三月，徽州府城迎春赛会，设戏台三十六座，遍请吴、浙、越梨园戏班。”由此可知，徽州府所请越梨园戏班定然是演唱余姚腔的戏班。怪不得在《安徽风物志·地方戏曲》中也说：“徽剧的渊源是徽池雅调。早在明嘉靖年间，‘余姚腔’就在青阳、贵池一带流行。这时，‘弋阳腔’又从江西传来，与‘余姚腔’结合，融合民间歌曲，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青阳腔’。这种新曲调的特点是‘滚白滚唱’，即把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口语词汇，加进唱词和说白中，突破了弋阳腔曲牌连缀体的套式，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反倒替代了‘弋阳腔’。”所谓“青阳腔”特色的“滚白滚唱”，恰恰是“余姚腔”的特色。“滚白滚唱”就是指曲文中夹着许多以七字句为主的“滚白混唱”，是用流水板迅速地快唱，它又叫作“滚白”“滚唱”“滚调”，它明快似流水，是“余姚腔”通俗的唱法。可以说，“青阳腔”是在受到“余姚腔”的影响之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兴声腔。

入清后，“余姚腔”“青阳腔”又给京剧以较大的影响。到清乾隆年间，“余姚腔”仍盛演不衰，附刻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笠翁渔翁《笺注牡丹亭》中的《笠翁批评旧戏目》特别指出：“且场上杂白混唱之俚词肤曲，聊以代言，老余姚虽有德色，固不足齿。”文中的“杂白混唱”“俚词肤曲”“老余姚”均指“余姚腔”，于此可见时至乾隆年间，“余姚腔”仍活跃在舞台上，只是已经开始出现衰落的景象罢了。由于“余姚腔”在舞台上逐渐消失，“弋阳腔”遂一度兴盛起来，取代了“余姚腔”的地位。然而，“余姚腔”并非就此断绝，姚燮（1805—1864）在

《今乐考证·缘起》中写道：“越东人呼‘弋阳腔’曰‘调控’。”而绍兴人又把“调控”叫作“高调”，属于声高调锐用假嗓唱的高腔系列，而“余姚腔”也同属高腔系列。“余姚腔”与“弋阳腔”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怪不得有“康陵初，变‘余姚’为‘弋阳’”的说法。在清代，“弋阳腔”与“高调”已成同一名称，就此看来，特别是从调控班“人声帮唱，锣鼓伴奏”的曲牌体音乐来看，它的唱法应是“余姚腔”的遗响，它的遗韵仍可在“调控班”和“平调班”的声腔中找见。如著名“调控”女演员朱楚生擅长“余姚腔”和“昆腔”，并以之融于“越腔”之中，形成别具特色的“调控”声调。

至今为止，有关“余姚腔”剧本已知的仅有《十义记》《刘汉卿白蛇记》《古城记》《白袍记》《珍珠记》，为数不是很多。1986年年底，安徽省徽剧团曾发现一本《水云亭》演出本，即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存曲目《高文举》，亦是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所列《还魂记》。据现代戏曲史家钱南扬等多位专家对此曲本的考订，依据此曲本有着滚白唱腔，以及全剧科白、方音土语等的特色，认为此曲本即是戏曲史家们长期寻觅的“余姚腔”曲本，它的发现为“余姚腔”孕育“青阳腔”，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线索。

作为历史上繁盛一时的古戏曲声腔——“余姚腔”，自明正德年间（1506—1521）兴盛，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消亡，风靡达300余年，为祖国的剧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时至今日，“余姚腔”虽已成绝响，但它的精华，为“弋阳腔”“青阳腔”“调控”等新兴声腔所吸收，使得“余姚腔”的演唱特色始终融合在多种戏曲声腔之中。另据戏曲研究学者告知笔者，现今在福建省靠近浙江的浦城县一带有木偶戏，用高腔演唱，唱腔中有较多的“余姚腔”声调，这是一个极好的研究线索，尚待调查核实。

余姚滩簧

余姚乃是戏剧之故乡，早在明代曾形成古典声腔“余姚腔”，影响广泛，并于成化年间见诸文献记载，至嘉靖年间传唱到常州、润州、池州、太平、扬州、徐州等地，并对各地地方戏曲的兴起与演变产生重大影响，直至清代初期，“余姚腔”才逐渐消亡。时经百余年之后，在余姚又产生了一种地方曲调——余姚滩簧。

滩簧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起始于明代晚期，有的认为起始于清初，而比较有根据而且通行的应该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其中亦有特殊的缘由：乾隆皇帝是一位极爱看戏的风流帝王，内廷供养着好几个戏班，时常在宫廷演出，供乾隆皇帝及后妃们观看。此情况直至乾隆做了太上皇之后仍长盛不衰。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皇帝驾崩，国丧期间，全国禁止演戏，这应属正常之事。问题在于新执政的嘉庆皇帝颙琰是一位非常俭朴的帝王，偏偏不喜欢看戏。而且自做太子时起就很看不惯内廷戏班人员的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因此，趁国丧之际，特下诏：不许内廷和民间演戏，百官亦不得私自教养戏班；解散内廷戏班，戏子统统赶出皇城。同时，嘉庆还将权臣和珅交刑部严加审讯，抄家，论死。由此一来，满朝文武臣僚尝到了嘉庆的严厉，孰敢不遵诏旨，所有王公大臣家的戏班也只好随同内廷戏班的散出而统统解散，离京四奔。大量无以为生的男戏子只好去当苦力，女戏子被官媒卖给民家为妻为奴。

就在这种禁止公开登台演戏的形势下，为了谋生，苏州的一名举人钱明树趁机召集流落到苏湖一带无以生存的男女戏子组成“地滩戏班”，以南词说唱为基调，又吸收昆腔的特色，于嘉庆五年开始，以清唱形式在苏州、上海等地偷偷地继续演出。由此而南北效仿，吴越一带相继出现了以坐唱班形式活动的小戏班。由于他们在演唱时推开剧本，照本子边看边唱边演，就俗称之为“摊铺盖”。“摊”谐音为“滩”，又因曾在上海滩演

出；“簧”是伴奏的管弦乐器的借称。

余姚滩簧是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之一，由曲艺发展而成的地方小戏，产生并盛行于姚江流域。余姚滩簧属“花鼓滩簧”（亦称后滩），花鼓滩簧来自农村，语言俚俗，表演诙谐，极具生活化，无固定表演程式。它脱胎于当地的车子灯、采茶篮、划旱船等民间歌舞以及雀咚咚等民间说唱艺术。它还有着多种别称，如鹦歌戏、秧歌戏、灯戏、串客戏、花鼓戏等。余姚滩簧是民歌体结构，通俗戏谑，属戏弄型的边缘戏曲，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所形成。

早期滩簧为立唱曲艺，角色仅“花脸”“旦堂”，称之为“二小戏”（小丑、小旦对子戏）。旦角手执手绢，丑角拿折扇。剧目多为言情小戏，反映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市民的生活情趣。曲词口语化，多用“清板”，音调以平四、紧板为主，插以地方小曲。

余姚滩簧和苏州滩簧同属滩簧腔系中的鼻祖，若按乾隆皇帝去世之年算起，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由余姚横河匡堰人虞才华创办的“才华班”，是余姚滩簧最早的组合班社，据说即创建于嘉庆初年。余姚滩簧流行于余姚、慈溪、上虞、绍兴一带，深受农村群众的喜爱。唱腔大致分为基本调和小调两类。基本调常用平四和紧板，小调则都是当地民歌小曲，如“送针调”“童子郎”“半哼哼”“对花十送郎”等。它的伴奏乐器主要有二胡、高胡、大胡、双清、三弦、琵琶等。

清嘉庆八年（1813），西溪山人所作《吴门画舫录》中有滩簧艺人小传，内载：“陈桐香，字璧月，行三，浙之姚江人。微眇含睇，蛾眉连蜷。裙下双趺，尤为绮丽，工演戏，非昆非弋，俗谓花鼓戏者，是浙东濒海邑，厥风甚盛。时值木棉脱树，采撷盈野，以戏进者日集。姬独不屑为。往来吴越，所识多豪门右族、贵戚公子。或买舟向村落居人敛钱演剧，士女如云，负贩駢集，陆博踏球之徒，以及游手无常业者，往往借姬以食，可谓超乎流辈矣……”从此小传中，可见其时余姚滩簧小戏其势已盛于昆、高诸腔，在乡间更甚。余治在《得一录》中记述清时滩簧演出盛

况：“当地演出，万众齐观，约妯娌，会姐妹，带女儿，邀邻居，成群结队，你拉我扯，都去看，做一日，看一日，做一夜，看一夜，全然不厌。”

作为地方曲艺代表的余姚滩簧有72本传统戏。代表剧目有《卖胭脂》《荡湖船》《十八摸》《庵堂相会》《打窗楼》《卖草囤》《卖红菱》等，具有当时“花鼓滩簧”的特色。《荡湖船》剧情简单，叙买布客人李君甫从松江贩细布去常熟，因航船脱班，李君甫雇熊德官一只荡湖船赶往常熟，一路上雇主与船娘，男女两人边歌边舞，对唱小调，互相嬉戏，对白逗趣，语言俚俗。由于滩簧小戏迎合基层民众、农夫农妇心态，在乡间普遍传唱，屡禁不止。

由于滩簧在当时纯属民间野戏，剧中充斥大量的淫秽内容来取乐观众，故此，赢得山乡农夫村姑的极大喜欢，以至有“村里来了滩簧班，男人忘记落田畈，女人忘记进灶间”的情景。故此受到官府及封建文人非议，《得一录》卷一五仪中有“俗语云：滩簧小戏演十天，十个寡妇九改节。向特以为甚言之耳，今观于某乡因演滩簧数目，两月内屈指其他寡妇改醮者十四人，多系守节有年，一旦改志者。更有守节十余年，孤子年已近冠，素矢不嫁，而忽焉不安其室，托媒改醮者”。“各处绅士乡耆，公禀县尊，请示严行禁止，并恳贤父母官飭差查察，见有花鼓淫戏者，立将为首之人及行头主，一并扭送至县重责不贷。”绍兴府飭禁淫戏颁发永禁碑中刻有“……秋成时间，有外来演唱淫词，曰‘花鼓戏’，每十日为一排，贿蔽开场，此最是伤风败俗。竖立禁碑，俾众触目惊心，以垂久远”。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亦曾在《论戏曲》一文中疾呼：“观《卖胭脂》《荡湖船》，即长淫欲之邪思”，“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故是等戏决宜禁止”云云。

由于滩簧戏中特多“荤”话，有伤风化，即为朝廷所不允许，故此，滩簧戏曾一直遭到禁演。自嘉庆年间到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对滩簧戏的禁令一个接一个，没有断过。例如，同治六年（1867）《上海道通飭

示禁淫戏颁发永禁碑式》云：“并于常年淫戏最多之处，竖立禁碑，俾众触目惊心，以垂久远。其乡间演唱花鼓、开设赌博场之人，应如何拿办，以靖地方。”1908年《嵊县自治会章程》中有一条说：“演戏之害最大，无论吉庆宴会，例禁止，并串客鹦歌等，均不准扮演，败坏风俗。”在余姚城里，滩簧当然不敢公开演出。当时余姚城区有城隍庙、关帝庙、保庆王庙、绪山庙、后横埭龙图殿、邬家道地、邵家花园等祠堂、庙宇戏台20余处，但都只能演出调腔、绍兴大班、越剧等，而绝不许上演滩簧。只有东泰门方久记、江南十八间等两三处，由于离市中心较远，才能偷偷地演出几场。或则于酒楼茶馆清唱几曲滩簧，唱毕即离开。由于统治者对滩簧戏的禁演，滩簧自身发展受到极大阻力，一路坎坷。

滩簧虽遭朝廷禁止，相对地说，由于官府对城外乡村鞭长莫及，禁演显得较松，尤其在官方的禁令难以控制的边远山村，更是盛演不衰，从未间断。如《清稗类钞》所说：“浙东濒海各县，厥风甚盛。时值棉花已采，以戏进者日集。”滩簧戏并未在禁令下消亡，反而逐渐壮大。由原对子戏、小三戏（一旦一生一丑）向六七角色的《珍珠塔》《卖妹成亲》《双珠凤》《玉蜻蜓》等大戏发展。演出区域也向外扩展。余姚滩簧也由此而滋长出它的生命力，暗中发展而逐渐进入公开化。

到同治年间，外地滩簧纷纷流入上海租界，在酒楼茶馆演出，并进入富贵人家的堂会，使上海成了各地滩簧的集散地。大约于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前后，余姚滩簧的老艺人马楠本最早进入上海滩演出，曾在上海滩崭露头角，风靡一时。光绪年间，余姚滩簧南下浙南，北抵上海，盛极一时。1906年至1936年，是余姚滩簧在上海的旺盛时期，不少余姚滩簧艺人在上海滩上挂牌演出。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引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流散在上海等地的滩簧艺人纷纷逃回家乡。但家乡也不安静，“野鸡部队”及各种土匪趁机作恶害民，仅在余姚一地就有双枪女匪首王八妹、土皇帝浩然、阎罗王陈金木等，大肆为害乡曲，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再加上杂牌军出没，火并残

杀，城乡动荡，社会极不安宁。群众唯恐逃难不及，哪有心思看戏，滩簧艺人大都只好转业，没有其他才能的只好听命运的排布，穷困潦倒，随局势的沦落而沉沦。可以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也是余姚滩簧的灾难之季。在这种年月里，唯有几个酷爱艺术的艺人，组建了几个滩簧小班子，如“赵家班”“培香班”“自由舞台”“紫兰阳春”“姚北第一台”“德胜顺舞台”等班社，昼伏夜出，如打游击般地偷偷演出，在黑夜里煎熬。为了对付官府的禁演令，滩簧班还采用前半夜演绍剧或越剧，到下半夜演滩簧之法。就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不少滩簧班先后解散，唯有“德顺胜舞台”一直坚持到1948年，为滩簧艺术在最艰难的条件下生存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滩簧的演出尚且不能公开，当然更无对滩簧史事的专门文字记载了，故此，有关滩簧起源、发展、演出等许多情况，只是依据老艺人们的师徒口头相传，有不少说法必然与史实有所出入，在所难免。

1953年，在余姚滩簧这一剧种已经奄奄一息的情况下，黄承炳、胡家良等17位老艺人以一副夹箩担的道具起家，创立了“余姚滩簧小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余姚滩簧专业演出团体。到1956年，随着余姚滩簧改称为“姚剧”，滩簧小组也改称为“余姚姚剧团”。同时，他们对姚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招收青年演员，对传统剧目进行清理，去除糟粕，保存精华，并新编多幕大戏《半夜鸡叫》，在省会演中获奖。随后又先后编演了不少现代小戏，使姚剧唱腔在观众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从而振兴了姚剧，使姚剧开始走上了正路，使一个古老粗野的地方剧种逐步兴旺起来，以文明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成为至今尚活跃在舞台上的浙江四大滩簧（姚剧、甬剧、湖剧、婺剧）之一。